



[美]保罗·费耶阿本德 著
陈健 柯哲 译

费耶阿本德在本书中对强调“进步”和“发展”观念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发起了猛烈挑战，后者对社会的损害和生态的后果现在已被人们广泛认识到。本书所有的文章都坚持一个哲学目标，不论是讨论希腊艺术和思想，还是为教会对伽利略的斗争做辩护，或是探求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抑或揭露卡尔·波普尔的教条主义，费耶阿本德均捍卫了科学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他坚持认为，对理性的追求是空的，它必须被从属于公民和共同体需要的科学观念所代替。

挑衅，争论；严密的证明。本书激怒了费耶阿本德的批评者，并令他的众多拥护者兴奋不已。

告别理性

Farwell to Reaso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N02/114

2007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告别理性
Farwell to Reason

[美]保罗·费耶阿本德 著
陈健 柯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理性/[美]费耶阿本德;陈健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

ISBN 978 - 7 - 214 - 03328 - 4

I. 告… II. ①费… ②陈… III. 科学哲学—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767 号

Farwell To Reason

Copyright © 1987 by Paul Feyeraben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2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0-064号

书 名 告别理性

著 者 [美]保罗·费耶阿本德

译 者 陈 健 柯 哲

策划编辑 汪意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刘摹摹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3328 - 4

定 价 23.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关于相对主义的注释	19
一、实践相对主义(机会主义)	20
二、政治的结果	34
三、希罗多德和普罗泰哥拉	37
四、普罗泰哥拉的真理观和现实观	45
五、民主相对主义	50
六、真理和现实:历史的对待	58
七、经验相对主义	68
八、一些关键评论的审查	71
九、回到生活	76
第二章 理性、色诺芬尼和荷马诸神	93
第三章 知识与理论的角色	108

一、存在	108
二、知识	110
三、知识的形式	114
四、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兴起”	117
五、关于理论的解释	121
第四章 创造性	132
一、作为模仿的科学与艺术	132
二、作为创造性事业的科学与艺术	135
三、爱因斯坦关于创造性检验的观点	136
四、作为个人创造性思想基础的人的观点	142
五、重返整体性	144
第五章 科学和艺术在哲学中的发展	147
一、两种进步	147
二、它们的不同性质	151
三、艺术的进步	152
四、哲学	158
五、科学中的情形	160
关于该文讨论的评论	163
第六章 琐碎的知识:对波普尔哲学之路的评论	167
一、批判理性主义	167
二、证伪和实在论	174
三、量子论	185
四、历史结论	191

第七章 马赫的研究理论及其与爱因斯坦的关系	199
引言	199
一、马赫论研究中原理之运用	200
二、爱因斯坦对原理的运用	201
三、被驳倒的对马赫的某些批评	202
四、马赫关于归纳、感觉和科学进步的思想	205
五、爱因斯坦的不合理的实证主义和马赫的辩证理性主义	209
六、原子和相对论	216
七、应吸取的教训	219
后记(1988年)	220
第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数学和连续性理论	226
片论	226
第九章 伽利略与真理的专制	254
附录	268
第十章 普特南论不可通约性	272
第十一章 文化多元论还是勇敢的新一元论	281
第十二章 告别理性	289
一、综述	289
二、科学的结构	290
三、个案研究	295
四、科学：传统之一	307

五、理性与实践.....	315
六、自由社会的要素.....	318
七、善与恶.....	321
八、告别理性.....	327

导 论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论述了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转型的问题。它们试图说明当同一性减少我们的快乐和我们的(智力的、情感的、物质的)财富时，多样性是有益的。

有些强大的传统势力反对上述观点。他们也承认人们也许会以多种方式安排生活，但他们补充道，多样性必须有所限制，这种限制由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和限定人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自然准则所组成。哲学家们，从柏拉图(Plato)到萨特(Sartre)，和科学家们，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到蒙那得(Monod)，他们都曾主张制定这些准则。他们也都曾对仍然存在的多样性(价格、信仰、理论方面)抱怨过。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这些抱怨急速增长。我们常听到“当代文化处在危机中”的说法，它被深刻的矛盾所撕开。矛盾双方一方是传统人文主义者对人和世界的看法，另一方是没有机械论描述的科学的价值。此外，古典文学、哲学、艺术和社会思想被“文化失谐”和“哲学疾病”所侵蚀。这种极端观点是某些批评家观察到的分化。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最近所说的一种新的混沌(unsurveyability)：人们很难在浸没大众生活的式样、理论、观点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出

路。^①这些抱怨惊人地相似。“文化”时常变得混乱这是事实,这种趋势不是新的,并且被强有力地反向趋势所平衡:一些学派胜过、蔓延和吸收其他学派,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创造了交叉学科(例如:合作反射、分子生物学),宏大的统一计划(进化论、整体论、身心问题的二元解决方案、语言学理论)使重要的区别变得模糊,电影、计算机艺术、摇滚音乐、高能物理学[参考 A. 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引人瞩目的论文《构造夸克》,芝加哥 1985 年]以一种与 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相似的方式同商业原则、艺术灵感和科学发现结合起来,分化存在,但也存在新的、强有力的统一。

批评家们所表现出的缺乏预见性更使人吃惊。他们所说的“当代文化或世界文化的危机”指的是西方学院的和艺术的生活,但同西方商业、科学和技术传播的稳步增长相比,关于教授的争论和西方艺术的扭曲变得不重要了。西方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为特征,并独立于意识形态、种族和政治的差别,西方文化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和文化。上述情况锻炼了我们知识分子,这是毋庸置疑的,得到强大的团体和机构智力上和政治上支持的一系列统一的观点和实践被加强、输出和再加强。^②现在,在地球最遥远的角落都能发现西方生活方式。在 90 年代前还不知道西方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也被改变,文化差异消失了,土著技术、习惯和组织被西方的所代替。下面一段话摘自美国寄生虫学会一篇主席演讲,其中对这个过程有精辟的描述:

工业化时代前,土著社会的本质是它们的多样性和本土化。每一种都与特定的居民相联系,并且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多样性的居民产生了同样多样性的人类社会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环境约束。

与此相反,工业技术发展的特征是一个受控的、相对统一和高度简约的环境,它通常将物种的种类减少到一些教化的形式,包括人类、偶然定居的植物和动物。……高度的环境恶化和广泛分散的均质化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和经济系统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唐纳德·海纳曼(Donald Heyneman),《寄生虫学会杂志》1984年,第6页)]。

弗朗科斯·雅各布(Francois Jacob)的简明结论是“我们受到单调性的威胁”(《可能性和现实性》,西雅图和伦敦1982年,第67页)。西方文明自身丧失了太多的多样性,以致一位美国作家在1985年4月14日的国际先锋论坛中写道:“像扩散的雾,同一性吞没了全国(指美国)。”同自然、社会和技术同一性的巨大趋势相比,使文化批评家们不快的冲突变得不可见了。

同一化的趋势是无益的,即使通过那些至今仍鼓励它的人的价值观来判断。世界范围的生态学问题被人们广泛地描述和理解。许多人通过自身的经历了解它(河流、海洋、大气和地下水的化学和放射性污染;臭氧层的减少;动物和植物种类数量的急剧减少;森林的减少和土地的沙漠化)。第三世界的许多问题,诸如饥饿、疾病和贫穷,看起来是西方文明的稳步发展造成的,而不是被它所加重的。^③对于许多社会来说,获得知识是生活的一部分;获得的知识是相对的,同个人和群体的关注方面有关。学校、教养和“客观”知识同当地状况和问题的分离使它的认识上的成分变得不存在,并使它变得荒芜和没有意义。这里,西方通过将学校和生活分离并使生活面对学者式的规划,从而导致了这种方式。^④

对典型土著文化及其全球联系现象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有许多种。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他们发现了而不是错过了美好生活的秘密。即便是军备控制之类

的高科技问题也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被“主观”所渗透。例如，文化组件(cultural components)^⑤。在我已经引用的雅各布的一段中写道：

“在人类中”，自然多样性……被文化多样性所加强。这使人类更好地适应多样的生活并更好地利用世界的资源。然而现在我们受到单调性的威胁。人类在信仰、风俗习惯和组织上非同寻常的多样性正在日益减少。不管是人们生理死亡，或是在工业文明提供的模型影响下被同化，许多文化正在消失。如果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无聊的世界上，那里只有一种技术，洋洋洒洒式的说话，同一性的生活，那么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必须更好地使用想像力。

本书所收论文批判反对这个观点的哲学家，支持这个观点。

尤其是，我将批判两种使西方式扩张在知识上受尊敬的思想——理性的思想和客观性思想。

说某一程序或一种观点是客观的，也就是声明不分人类的期望、思想、态度和愿望，它都是有效的。这是当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观点。然而，客观的思想比科学要早并与之无关。当一个国家、部落或文明通过(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规则确定其生活方式时，它就出现了。当具有不同的客观思想的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在一起时，它变得更明显。对这种事情有各种反应，我提及三种。

一种反应是坚持：我们的方式是对的，我们无需改变。和平的文化试图通过避免接触而避免改变。例如披米族(Pygmies)或菲律宾的明多罗(Mindoro)，他们不与西方入侵者打仗，他们也不屈服，他们就简单地从西方的影响范围内迁走。而好战的民族会使用战争和谋杀来根除不

符合他们希望的文明。E. 凡吉林(Eric Voegelin)写道：“摩西法中充满着许多对坎纳(Canaan)的乔伊人(goyim)，特别是对城里的居民实行狂热的种族灭绝的血腥想像。制定对乔伊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动机是厌恶他们崇拜其他的神而不是耶和华：《申命记》中的以色列战争是宗教战争。把战争看作是灭绝视野内不相信耶和华的人的工具，这种观念是对《申命记》的革新……(《秩序和历史》，第一卷：《以色列和天启录》，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出版社 1956 年, pp. 375f)。西方文明的代表虽然也喜好人道主义的口号，但并不总是反对这种观点。

持续性表征了(物理和社会)科学方面许多最新进展。这些发展是整体的，强调历史进程而不是宇宙法则，并使“真实性”从观察者和被观察物的(通常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那些鼓励这种趋势的作家[博姆(Bohm), 詹斯赫(Jantsch), 马图拉那(Maturana), 普里高津, 瓦拉(Varela), “发展认识论”支持者和其他一些人]通过显示这种持续性以及显示它多么适应他们的规则来消除文化多样性。不是对个人的社会选择提供准则，而代之以后退到他们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这里解释为什么事情曾经是那样，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而且将来它们会怎样。这非常像过去的客观主义，只是用革命和伪人道主义的语言包裹起来。

第二种反应是投机主义：相互冲突的文化(的领导者)比较各自的组织、习俗、信仰，接受并适应那些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历史状况，参与者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需求和期望。它也许会导致文化内部的巨大斗争，甚至会被天气的临时变化所影响。天气会夸大某些错误并消除另外的。无论如何，文化的投机的遭遇不能被减少到一个一般的尺度。文化投机主义被个人、小组和整个文化所实践(并仍在实践)。例子之一是青铜器晚期居住在近东的民族、王国和部落。埃及古生物学家亨利·布雷斯特(Henry Breasted)称之为“第一次国际化”。这些王国、民族彼此之间常发生战争，但他们也交换物资、语

言、工业、方式、技工,比如建筑家、航海家、没落文人甚至神[详见 T. B. 韦伯斯特(Webster):《从迈锡尼到荷马》,纽约 1964 年]。另一个例子是蒙古帝国。马可·波罗证实了胜利者成吉思汗对外来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并且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改变它们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大汗自己认识到了外国风俗的重要性。一位建议者曾试图通过摧毁城市使他们自己的游牧式生活习惯统一化。大汗反对这种主张。另一个有意思的现代例子是卡伦·布利克森(Karen Blixen)的肯尼亚的本土人(见 I. 迪尼森的《走出非洲》,纽约 1985 年,第 54 页注),他们由于结识很多种族和部落因而是更完整的人,相对于市郊或省城的定居者来说——这些人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成长,有一套固定的理念。

第三种反应是相对主义:习俗、信仰、宇宙观并不简单是神圣的、正确的、真实的。他们对一些社会来说是有用的、有效的和正确的,对另一些则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无效的、不正确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介绍的,相对主义有许多形式,一些是凭直觉的,未经深思的;另一些则具有高度的智慧,它比一些有智慧的批评家所认为的还要广泛。比如,想逃离西方生活方式的披米人就是相对主义者而不是教条主义者——假设他们在乎这当中的差别(见 C. M. 特伯尔的“披米族的教训”,《科学美国》208(1),1963 年)。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希腊人介绍了另一种方法处理文化多样性。他们试图将其分为正确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式,他们既不依赖于坚持传统,也不依赖于特定的改变;他们依靠辩论。

现在辩论已不是新发现。辩论出现在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中。它在机会主义方法中有重要的作用:一个机会主义者必须问自己,外来事物能怎样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且它们将会带来其他哪些变化。偶尔“原始人”会同试图把他们变为理性主义者的人类学家论战。针对这种事情,埃文思-普瑞查德(E. E. Evans-Prichard)写道:“让读者自己思考

任何辩论,那些会使艾占得(Zande)所宣称的其神论的威力完全消失的辩论”(威切克拉夫特:《艾占得的神论和魔术》,牛津 1973 年,第 319 页注)。如果使用艾占得的思考方式,那么他们整个信仰结构是值得支持的。因为他们的神学概念是完全连贯的,通过逻辑纽带网相互联系。它们是如此有组织,以致从不与经验相矛盾,相反,经验看起来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我是说”,埃文思-普瑞查德补充道,“我发现这(例如,询问日常事情决策的神谕)同其他我所知道的方法一样,也是一个处理家庭和事业问题的满意的方法”。辩论,就像语言、艺术或礼仪,是广泛存在的,但也如同语言、艺术或礼仪,它是多样的。一个简单的手势或一声抱怨能使一个辩论满足一些观众,而其他人需要长时间和生动的演说才能使观众信服。辩论在希腊哲学家们开始考虑它之前就已经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希腊人真正发明的不是辩论,而是一种特殊的和标准化的辩论方法。他们认为这与辩论发生时的情况无关。这个标准有广泛的权威。所以古代认为真理与传统无关的思想(它可被称为一种客观的物质概念)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问题,它已被不太古老的认识寻找真理的途径与传统无关的思想所代替。现在合理地使用前提意味着使用这些方法接受其结果。

客观的形式概念存在着与物质概念相似的问题。这并不奇怪——“形式”程序在一些世界有意义,而在其他地方变得很傻。例如,随着日益广泛的解释而产生的无休止的批评的要求在一个有限的(定性的和定量的)宇宙里崩溃了。倾向于分裂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物质安全和精神职责,也许会因为伦理的原因而被拒绝:一些人更喜欢稳定而繁荣的世界而不是经常地适应新思想。寻找反驳的证据并严肃对待它们的要求会导致一个有序发展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中反驳的例子很少,并以很长的间隔出现,比如大地震。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能提高、建造和平的生活,从我们的一种理论到另一种驳斥它的理论。但所有这些是不可

能的,如果理论被“异常的海洋”所包围,而这是大多数社会事务的实际情况(参考我的《哲学论文》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坎布里奇,马萨诸塞)。把基本信念客观化的习惯或研究成果在一个有一些补充形式的社会里和一个接触并适应相邻社会的社会里变得毫无意义。在一个认为老妇人拥有“圆润的、甜美的好嗓子”的世界里,无矛盾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伊利亚特》,3.386ff)。结论是清楚的:文化多元性不能被客观真理的形式概念所驯服,坚持某一特定形式概念的人易于出问题(在他们看来),就像世上某一特定概念的保卫者一样。

随着科学的发展,信息储量稳步增长。客观性的形式概念不仅用来创造知识,也使之正统化,例如:显示已经存在的信息体的客观有效性。这导致了更深远的问题:世界不存在有内涵并且与导致现代科学上升和发展的事件相兼容的一般性规则的有限集。人们发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保卫的形式需求与他们所支持的发展集相冲突。为了解决冲突,需求被不断地减弱,直到它们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⑥

科学家们也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暗中破坏研究的普遍原则。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可以作为科学参数的一部分而被提问,而且科学能因此前进。这正是量子理论里所发生的,在诸如马图拉那和瓦拉的心理学研究里,在马赫(Mach)的知觉心理学调查里,谁曾想到宇宙起源的“矛盾的”(爱丁顿)和“神学的”(霍伊尔)理论重新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弗里德曼(Friedmann)的计算和哈勃及其他的一些发现精确地导出这个结论。谁曾想到科学能被明确的反面证据所支持并从中受益?但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嘲笑那些对“无用的证明”的关心,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取得进展。看一下古老的量子理论的研究历程或发现DNA结构的发展进程,它表明靠逻辑上严格的辩论导致科学发展的想法只是一个梦。^⑦当然,所有基本的混沌的程序是严格的——但它的严格是符合情况的、复杂的,异于我们缺少天赋的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的“客观的”严格。^⑧

在保护西方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二种思想是理性(Reason)或者说合理性(rationality)的思想。正如客观性概念一样,它具有一种物质的和形式的变体。在物质的观念里要成为理性的,意味着避免某些看法并且去接受另外的看法。对早期基督徒中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诺斯替派,连同它的有色统治阶级及其奇怪的发展,是非理性的。今天,非理性意味着,比如,相信占星术,相信灵魂创造说,或者对于不同的群体,相信智慧的种族起源。在形式意义上的理性意味着遵循某一过程,顽固的经验主义者把与实验相矛盾的清晰的观念视为非理性的,而顽固的理论主义者嘲笑那些只要事件有一星半点变化就修改基本原理的人的非理性。这些例子表明,几乎不可能让诸如“这是理性的”或“这是非理性的”这样的陈述去影响研究。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几乎不可能得到清晰的解释,企图强迫它们将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非理性”过程常常导致成功,而“理性”过程可能引来大量问题。严格说来,我们这里有两个词:“理性”和“合理性”,它们几乎能和任何思想和过程相连,因而环绕着它们的是一大堆优点。但是这两个词究竟如何发挥它们巨大而美丽的力量呢?

假设存在着大量有效而必须遵守的知识和行动的标准,这个假设是信仰的一种特殊情形,该信仰的影响远远超出知识分子争论的范围。这个信仰(对它,我已经给出了一些例子)可以这样形成:通过声称存在着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世界必须去接受它。这个信仰大大地博得了穆斯林的欢心;它伴随着十字军进行血腥的战争;它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它导致了断头台,今天它为科学、自由和尊严的自由论者和/或马克思主义捍卫者无休止的辩论提供着原料。当然,每一种运动都对其信仰加入它自己的特殊内容,当困难出现时它就改变其内容,当个人或群体利益面临侵害时它就曲解它。但是如下的思想总是起着而且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即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容,它普遍有效而且它为干预进行辩护(正如

我上面已经指出的,这一思想甚至被客观论者和还原论者持有)。我们可以猜测,当重要的内容从一个中心、一个王国或一个不容抗争的上帝——它们支撑并给予世界观权威——那里逃遁时,剩下的只是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理性和合理性是相似王国的权力,它们被同样的光环所包围,如上帝、王国、暴君及其残忍的法律。内容已经逃遁,光环留了下来,它使得权力苟延残喘。

内容的缺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促使特殊群体声称自己为“理性主义者”,去声明大量被认可的成功是理性的杰作,去运用力量而获准对与他们利益相冲突的发展进行镇压。无需多言,这些声明中的大多数是虚假的。

我已经提到过科学的情形:他们超越一种循规蹈矩的方法,但是发生的模式是不稳定的,因而不能被推广。启发(Enlightenment),被声称是理性的另一个礼物,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真实的。“启发”,康德写道(“什么是启发?”引自 L. W. 贝克编,《康德论历史》,自由艺术图书馆 1957 年,第 3 页),“是男人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释放。不成熟是男人在他人没有提供直接答案的情况下不能利用他的理解力。自我招致(Self-incurred)就是这种不成熟,当它的起因不在于缺少理性,而在于缺少解决答案时。”此句中的启发在今天是很少见的。公民从专家那里而不是从独立的思想中得到线索。这是今天“成为理性的”含义。个体、家庭、村庄、城市生活中不断增加的部分被专家占据了,当一个人说“我感到抑郁”时,很少不会听到反问“难道你是心理医生?”。^⑨“如果我有一本能理解我的书”,康德很久前写道,“一个能让我觉醒的牧师,一位能决定我饮食的医生,等等,我就不必麻烦我自己了,只要我付费,我不必思考了——他人乐意为我承担这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的确,存在着而且总是存在着理性的希望,总是存在着那样的人,他们与陈规作斗争并捍卫在他们看来是正当的个体生活、思考、行动的权利。整个社会,一直追溯